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六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目 录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 （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九日）	1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的电报（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	7
给齐吉树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	9
关于控制高级社发展数目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	10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的号召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12
对达赖喇嘛祝贺新年电报的复电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13
对班禅额尔德尼祝贺新年电报的复电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14
关于注意研究解决小学教师待遇低等问题的 批语（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四月十一日）	15
写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后面的一些文字 （一九五六年一月）	17
对廖鲁言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说明稿的批语和	

修改（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20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22
关于发表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25
给宋庆龄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26
给黄宗溍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27
给许志行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28
对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29
关于建立青年生产队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31
对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的	
修改（一九五六年一月）	32
关于检查同苏联专家、顾问关系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	34
在汪东兴关于江西部分农村合作化发展情况报告上	
的批语（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36
给刘松林的信（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	38
吊唁杨树达逝世的电报（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	39
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禁止谈论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	40
转发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二十日）	42

关于发表郭沫若访日诗篇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44
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和 修改（一九五六年二月）	45
关于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日、五日、七日）	47
毛泽东等吊唁贝鲁特逝世的电报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三日）	50
关于公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命令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	52
给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书记拉科西的信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53
对中央所拟各地经济工作汇报提纲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	54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的 批语（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	57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四日）	59
对彭德怀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 题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	68
同意将南京军区划分为南京、福州两军区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	69
接受丹麦大使格瑞杰生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日）	70

对中央就战犯处理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稿的批语和 修改（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一日）	72
关于请中宣部讨论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 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	74
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电报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76
为印发徐运北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77
给毛宇居的信（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79
给毛华珠的信（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80
给毛泽荣的信（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81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82
倡议实行火葬（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110
给贺果的信（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112
中央转发中央代表团关于当前西藏动态和代表团 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六年五月八日）	113
公布关于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的命令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二日）	115
中央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 的通知（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	116
写在湖北省财贸工作汇报提纲后面的文字 （一九五六年五月）	118
中央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补充通知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	119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日)	120
接受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三日)	122
中央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的通知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	123
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一处带原则性	
修改的批语(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125
接受罗马尼亚大使尼古拉·乔洛尤呈递国书时	
的答词(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126
关于公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命令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	127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	
电报(一九五六年七月九日)	128
关于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命令	
(一九五六年七月九日)	130
关于国庆阅兵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 ...	131
对中央转发王观澜关于江浙农村情况报告的批语稿	
的修改(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132
关于变更区一级自治区和建立民族乡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134
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	136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修改和批语	
(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	165
对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草案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	167
给曹云芳的信(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一日)	170
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八月)	172
给达赖喇嘛的信(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	173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175
在欢迎老挝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186
对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稿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187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九五六年八月)	189
对彭德怀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192
对李立三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194
毛泽东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	
(一九五六年九月)	195
关于修改和播发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十二日)	196

对陈绍禹不能参加党的八大的电报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198
对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 报告稿的批语（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	199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201
接受埃及大使拉加卜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	206
给黄炎培的信（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	208
对周扬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210
关于讨论和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211
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谈话和印发谈话记录 的批语（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月）	213
对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祝贺中尼协定签订的电报 的复电（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224
关于公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的命令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225
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226
为鲁迅迁葬墓碑题词（一九五六年）	227
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日）	228

在苏加诺总统为印尼建军十一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 讲话（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	230
为北京日本商品展览会题词（一九五六年十月）	232
给戴毓本的信（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	233
对金日成关于志愿军赴朝参战六周年贺电的复电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234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	235
关于合作社养猪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238
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241
关于团结党外军人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243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244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247
关于土特产品收购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248
在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稿上加写的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250
对《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章乃器的一些情况》的 批语（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251
对邓子恢关于龙岩县农业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的 批语（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日）	253

给黄炎培的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255
给周世钊的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258
给贺果的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260
对浙江执行侨务政策情况报道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261
给杨开智的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262
给毛春秀的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263
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264
对中央关于西藏问题复电稿的修改和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265
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密切军队和地方关系的报告 的批语（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267
给黄炎培的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268
给杨开英的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269
对邓子恢关于撤区并乡 试验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70
关于上海天主教工作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72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74
对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加强地方政协工作意见的指 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76
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稿的	

修改（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78
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0
给周世钊的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2
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283
关于登载高士文章的批语（一九五七年一月三日）	286
印发江苏省委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一月四日）	288
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肃反工作的意见	
（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	290
对《评艾森豪威尔主义》一文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	292
邀请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的信	
（一九五七年一月六日）	293
印发《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的	
批语（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	294
给臧克家的信（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296
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重写的题词（一九五七年）	297
为洞头岛烈士墓纪念碑题词（一九五七年）	298
在公安部关于处理在押病残战犯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日）	299
对邓子恢关于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的	
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	300

给黄炎培的信（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日）	301
对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稿 的批语（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302
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304
对日本战犯榊原秀夫亲属来信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305
关于调查河北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合作社问题的 批语（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306
对彭德怀关于外出检查军事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308
对军委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报告的 批语（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309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 （一九五七年二月）	310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316
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 （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	361
关于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四月六日）	364
给班禅额尔德尼的复电（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366
关于同意甘孜藏族自治州继续进行民主改革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	368

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	370
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提纲)(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374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378
对《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	396
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398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一九五七年三月)	399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	403
在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 上的批注(一九五七年三月)	406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日)	417
欢迎和感谢波兰政府代表团访华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九日)	419
对整风运动决定草案的批语和中央关于试行这一 决定草案的通知稿(一九五七年四月)	421
关于请胡乔木阅读《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一文的 批语(一九五七年四月)	423
给张维暨夫人的信(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	424

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 （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月）	425
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 和执行情况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	432
给袁水拍的信（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434
给达赖喇嘛的复电和对复电稿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436
接受瑞士大使贝努义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438
对中央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的批语稿的 修改和说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440
接受保加利亚大使涅加尔科夫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443
关于《人民日报》等报纸的理论水平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445
接受越南大使阮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446
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447
关于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实习生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449
对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451
关于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的批语和按语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	453
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455
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457
对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稿的	
批语(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十一日)	462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	464
给李淑一的信(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466
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	468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469
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	477
接受匈牙利大使诺格拉第·山道尔呈递国书时的	
答词(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480
接受蒙古大使苏诺姆·鲁布桑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482
给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达姆巴的信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483
关于制止税收工作中违法乱纪行为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486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关于发表赵一明发言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	515
关于了解北师大情况给何锡麟的信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	516
接受朝鲜大使李永镐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517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不平常的春天》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七年六月）	519
关于接待许志行给韶山乡的信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521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法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522
对美国《新共和》杂志一篇文章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523
关于印发《整风专辑》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524
对谭震林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 的报告批语（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525
关于转载和播发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谈话的 批语（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527
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528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	529

关于拟在三峡游泳给中央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	535
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 的通知（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537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539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	541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	543
中央关于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	554
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556
给林克的信（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	558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	559
祝贺印度尼西亚独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	561
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的 修改（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562
给达赖喇嘛的信（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564
关于同意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 一文的批语（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九日）	566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567
祝贺马来亚独立的电报(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日)	569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570
对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 指示稿的批语(一九五七年九月)	572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	574
对《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一文的批语和 修改(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	576
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文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	578
为查找《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一文写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	580
给陈云的信(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	581
在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	582
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	584
关于转载上海工商界批评高方的报道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585
关于印发《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	586
国庆之夜会见各国贵宾时的谈话	

人员条例的命令（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624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十六日、十八日）	625
公布关于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可以每年	
举行一次的决定的命令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648
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649
为感谢苏联人民的情谊给《真理报》的信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652
给苏联领导人的感谢电（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653
祝贺诺沃提尼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655
对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656
给张明霞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658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和解放纪念日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660
毛泽东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663
给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慰问电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	665
关于讲卫生、除四害问题的批语和信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666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稿 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

（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九日）

—

恩来同志：

几天来我们和各地负责同志一道，替中央拟出了一个“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现送上三十九本。有些错字，已在一本上改正，请令秘书处照改，即可发给政治局委员，在京各中央委员及其他若干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请于知识分子会议^[2]开幕以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邀请在京中委和若干负责同志参加（云、贵、青、新、蒙、吉、黑、热、京、津各负责同志此次来到杭州的，应请他们参加），加以修改，作为草案通过，即可发给知识分子会议到会各同志征求意见；再加修改，即可发各地方党委，直至支部，征求意见。这里的会议^[3]，现在是汇报情况，大约九日可完。一部分到京

出席会议的同志可于九日晚，或者十日动身赴京。北京的会改于一月十三日开始，正好接上。

敬礼！

毛 泽 东

一月八日上午二时

有些指标数字尚待填入的，待廖鲁言〔4〕同志回京后，查明填入。

二

恩来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二十四条讲勤俭办社和第四十条讲工农联盟〔5〕，其余还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印成后，我又在一本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现派高智〔6〕于本日上午飞京，送上 53 本，请令秘书处照我改正的一本〔7〕，将未改的 52 本加以改正。

各省同志都要求以草案初稿的形式马上印发给下级党委，我觉可以，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可否请你于本日下午召集政治局或者书记处各同志开会一次，将此件看一遍，大略谈一下（其详待下次再讨论），决定是否可以让各省委用草案初稿立即下达各级党委（党外人士不在内）征求意见和安排工作，于本日下午六时以前用电话告我。待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草案定稿，通知各省的时候，再行正式下达。我们这里的汇报会议本日下午七时即可结束，我拟于今晚

十时动身返京。

敬礼

毛 泽 东

一月九日上午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5) 对于由合作社管制生产的反革命分子，合作社应当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则，给他们以应有的劳动所得。(6)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只要他们没有参与犯罪行为，应当允许他们入社，并且应当同一般社员同等待遇，不要歧视他们。

四

蔬菜是一项重要的副食品。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一律种植蔬菜，改善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城市郊区和工矿区附近的农民应当有计划地种植蔬菜，充分地保证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

五

要求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自己食用的和保证国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 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贝哈尔·什图拉同志：

值此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并且正充满信心地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最近阿尔巴尼亚参加联合国的事实定将使阿尔巴尼亚今后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对班禅额尔德尼^{〔1〕}祝贺新年 电报的复电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班禅额尔德尼：

谢谢你的新年祝贺。过去一年内，日喀则地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工作有进步，我们听到了都很高兴。现在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我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繁荣兴旺，西藏地方和别的地方一样，都是要一年比一年兴旺起来的。在新的一年里，你们那里也将会有更大的进步。我祝你身体健康，学业精进，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稿
刊印。

注 释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写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 后面的一些文字^{〔1〕}

(一九五六年一月)

四百斤问题^{〔2〕} (水的问题)。

储粮两年问题。^{〔3〕}

十二年基本消灭十种病虫害问题 (加了“可能的”的限制)。^{〔4〕}

省内外移民 1000 万户、垦荒五亿五千万亩问题 (与国营数是否有重复?)。^{〔5〕}

治病问题 (加了“在一切可能地方”一句)。^{〔6〕}

除四害问题 (作了限制, 应无问题)。^{〔7〕}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初稿)》,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为会议文件之三印发。毛泽东在这个印件上对纲要草案又作了修改,并在另外一页纸上写了本篇这一些文字。这一些文字,主要是对纲要草案中他所作的一些修改的说明,其他是表明他对纲要草案中某些问题的思考。此外,毛泽东还作了一处重要修改,即将第二条中老解放区和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基本完

对廖鲁言^[1]关于全国农业发展 纲要说明稿的批语和修改^[2]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

尚昆^[3]同志：

此件^[4]请即付印，校对勿讹，印 350 份，于一月廿五日下午三时带到勤政殿，发给到会的人，每人一份（共有 320 人左右）。

毛 泽 东

一月廿五日零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这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今后几个月内将还是一个草案，要请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加以讨论，提出意见。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许多人感觉短期内难于解决的城市一百多万失业人员问题，现在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浙江省嘉兴专区就要求从上海移入十万个劳动力，江西省也向上海要求把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失业人员移五十万人到那里去。至于地多人少的边远地区迫切需要劳动力，就更不待说了。解放以前遗留下来的这个一百多万尚未就业的失业人员，由城乡两方面去作安排，就可以在几年内使他们就业了。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载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注 释

〔1〕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2〕 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廖鲁言的说明稿比较集中修改的两段。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4〕 指经毛泽东改定的廖鲁言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是解放生产力^[1]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

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国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根据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

关于发表宣传全国农业发展 纲要的社论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即送人民日报

邓拓〔1〕同志：

这篇社论〔2〕不能用，因为完〔全〕和廖鲁言的报告〔3〕重复，并且还不及报告的详尽。我看，有了那篇报告，不写社论也可以了。如果要写，要由你们自己写，并注意不要和廖的报告重复。

毛 泽 东

一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为《人民日报》写的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稿。

〔3〕 指廖鲁言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对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的修改^[1]

(一九五六年一月)

—

我们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国际侵略集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话，我们也并不惧怕战争。

二

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三

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

给刘松林^[1]的信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得胜^[2]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

注 释

〔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一九四九年十月同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结婚。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一九五五年九月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刘松林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读书。

〔2〕 得胜，即李得胜，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使用过的名字。

关于发表郭沫若^[1]访日诗篇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送彭真^[2]同志：

内件^[3]请交北京日报发表。其中有些草体字须先改为楷书，以免弄错。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

〔2〕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3〕 指信封内装的郭沫若访日诗篇七首。郭沫若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至二十五日，应日本学术会议的邀请，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这些诗是他访日期间写的。信封内的七首是：“箱根即景”，“访须和田故居”，“别须和田”，“宫岛即景”，“访博多湾”，“留别华侨”，“游别府”。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北京日报》发表时，将“访博多湾”和“留别华侨”分别改题为“吊千代松原”和“归途在东海道车中”，又增加了“宿春帆楼”和“船入长江口”两首，这九首诗总题为“访日杂咏”。

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镇反 工作报告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五六年二月）

—

刘、周、瑞卿^{〔2〕}再阅，在尾上加了几句。

毛 泽 东

发后，抄公安部。

根据手稿刊印。

—

可以肯定地说，今年捕人的数目应当较去年大大减少，只捕少数非捕不可的人。杀人的数目尤其要少，只杀极少数非杀不可的人。今年三月底中央公安会议的时候，应当根据新的形势，重新拟订一个计划，报告中央审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写在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关于当前社会镇反工作意见的报告的批语稿上的批语。本

关于召开第二次防治 血吸虫病会议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日、五日、七日)

—

送中央卫生部

徐运北同志：

原定今年三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是否按期召开？准备情形如何？望告。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

毛 泽 东

三月三日

—

尚昆^[2]同志：

请你电话告知上海柯庆施^[3]同志和中央卫生部徐运北同志，今年三月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时候，应当邀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有血吸虫和钩虫病的省区派出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并问他们此次会议何日召开，

毛泽东等吊唁贝鲁特^[1]逝世的电报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三日)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斯坦尼斯瓦夫·斯克热歇夫斯基同志：

惊悉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同志不幸逝世，我们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同志是波兰人民敬爱的领袖，也是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的卓越战士。他的逝世，对于波兰人民和对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都是极大的损失。

我们深信：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同志生前的光辉事迹将永远鼓舞我们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波两国人民间牢不可破的永恒友谊而努力。中国人民将永远同波兰人民在一

对中央所拟各地经济工作 汇报提纲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

—

刘、周、彭真、小平〔2〕阅，尚昆〔3〕办。

毛 泽 东

三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中央最近分别听取了工业、交通、农林水和财金贸各
党组的汇报，在今后几个月内中央拟分别听各省委、市委、
区党委关于工业、运输、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

三

这种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
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同时，应当写成书面文件报送中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四日)

—

少奇、小平^[2]同志：

社论^[3]已由陈伯达^[4]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 20 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5]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毛 泽 东

四月二日上午四时

—

照此^[6]改正，再打清样十五份，于今日上午十点，连

同这份原稿，送交我的秘书高智，勿误为盼。

毛 泽 东

四月四日上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四

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着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

五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六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

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七

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

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

八

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九

鉴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了“发展进步

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实践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针是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情况的，是正确的。

十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犯严重错误的经验。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一年发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这个时期内，在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里还发生了同党的中央相对抗的反党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上述两个时期内所犯的错误，除了张国焘路线是属于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以外，都是全国性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我们党吸取了以前两个

革命时期的教训，没有让这条错误路线发展下去，这条错误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我们党的中央所纠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十一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们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根据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加写的题下说明。本篇(四)至(十一)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至四日多次审阅这篇文章时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3〕 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毛泽东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

〔4〕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5〕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6〕 指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所作的修改，即本篇(三)(七)(八)(十)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文字。

对彭德怀关于保卫祖国的 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 报告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

退彭德怀同志。此件看过，可用。中央各同志意见，在他们看过文件后，即会告知你。

毛 泽 东

四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为报送关于军委扩大会议结果的报告和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给毛泽东的简要报告上。彭德怀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战略方针问题，主要讲了以下问题：第一，争取持久和平，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第二，战略方针问题的提出；第三，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第四，关于阵地战结合运动战问题；第五，关于作战指导上的几个主要问题。第二部分关于国防建设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第二，动员准备工作；第三，建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

同意将南京军区划分为 南京、福州两军区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

刘、周、朱、小平〔1〕阅后，退彭德怀〔2〕同志。

此件〔3〕看过。同意划分为两个军区。叶飞〔4〕的省委书记是否可以不再兼了，何人充任省委书记的问题，请小平和谭震林〔5〕商定告彭。

毛 泽 东

四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3〕 指彭德怀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关于建议将南京军区划分为南京军区（辖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军区）和福州军区（辖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给毛泽东的报告。

〔4〕 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省长。

〔5〕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

接受丹麦大使格瑞杰生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递交的丹麦国王所签署的国书，并且感谢贵大使的祝贺。

自从 1950 年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丹麦王国建立邦交以来，贵我两国的关系沿着友好的道路向前发展着。今年二月，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贵我两国协议将双方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几年以来，中国人民杂技团，中国古典歌舞剧团曾经赴丹麦演出，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丹麦，中国工农业和艺术展览会也曾经分别在哥本哈根举行。丹麦的工会和文化代表团访问过中国；1955 年丹麦工商界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进行了贸易谈判，扩大了两国之间的贸易。这些友好往来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而贵我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加强，是有助于促进国际间的和平的。

我深信在贵大使的努力之下，贵我两国之间久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必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贵我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必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祝贺西藏自治区 筹备委员会成立的电报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1〕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位委员：

我愉快地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热忱地希望西藏各阶层人民在你们指导之下更加团结和进步，在发展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 泽 东

1956年4月20日

根据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为印发徐运北^[1]关于消灭 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印发五百份或更多些，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及廿五日到京的各省委书记。

毛 泽 东

四月廿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徐运北，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徐运北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三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有十四个省、市的党政代表参加。会议一致认为，血吸虫病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极深，不仅损害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严重地影响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和整个民族的前途。要在全国内范围内消灭血吸虫病，必须做到：一、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问题的关键；二、充分发动群众；三、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四、

论十大关系^[1]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

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

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

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

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一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

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

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

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

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

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

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2〕，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有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

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3]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4]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5]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

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

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6]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

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7〕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8〕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於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

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9]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 Q 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

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

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 中国和外国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

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0〕。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落后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七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

倡议实行火葬^[1]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国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有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

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

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关于你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问题，现在已由中南几个省市开始，接着将请华东几个省市汇报（时间可能在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日之间），然后再请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省市汇报（时间将在六月十日至七月底）。汇报的问题，可分为：（一）工业（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中央各部管的、地方管的和私人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交通运输业（陆、水、空，近代的和落后的）；（三）商业（内贸、外贸、供销合作和私人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农、林、水；（五）财政和金融；（六）干部（即教育工作）。以上各项都应作一些历史的和现状的叙述，并且应当有七年的或者十二年的远景规划，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中央各部管的为辅。写成书面文件，字数不拘，依内容决定，长的可以有一万字，或者两万字，甚至更长些，短的可以只有几千字。此外还有：（七）统一战线安排问题；（八）反革命分子安排问题（主要是就业安排）；（九）失业安排问题；（十）少数民族问题（无此问题的地方则略）；（十一）其他特殊问题（例如广东的

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向中央 汇报工作的补充通知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最近广东、湖北、武汉、广州等省委市委向中央汇报财经工作,均是以当地整个财经工作为对象(包括中央各部管的和地分管的);在工业方面多从中央各部管的大企业,例如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长江航务局、广州造纸厂、广东糖业公司等总结经验;在财贸方面,也是以当地整个财政金融工作和贸易工作为对象,加以分析,提出意见。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中央五月十四日电报〔1〕中所说各地汇报对象可以地分管的或者希望由地分管的为主,而以中央各部管的为辅这一点规定,应予取消。

中 央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即中共中央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见本册第 116—117 页。

中央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 要注意多种经营的通知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1〕，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项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粮食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作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帐，借以教育

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 一处带原则性修改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可以这样修改。

毛 泽 东

六月廿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的信中说：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修改稿中，第十四条加了一句“必要的时候，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可以暂时保留适当的土地报酬”，这是比较带原则性的修改，请酌是否合适。彭真转报刘少奇时写的信中说，“我觉得改得可以。但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的社员，与鲁言、总理电话商后，觉得还是用公益金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不给土地报酬为好”。刘少奇表示“拟同意照这样修改”。毛泽东看后，在“可以暂时保留适当的土地报酬”一句旁边批写：“可以这样修改”。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章程时，将这句话改为“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社员，应该用公益金维持他们的生活，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暂时给以适当的土地报酬”。章程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等祝贺 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 三十五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六年七月九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达·阿吉尔毕希同志：

当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1921年7月11日，蒙古人民推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三十五年来，蒙古人民不仅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并且在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对加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力量和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人民对于兄弟般的蒙古人民的成就感到万分高兴。

祝蒙古人民在和平建设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祝中蒙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关于国庆阅兵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

刘、周、朱、陈、彭真、小平^{〔2〕}阅，退彭^{〔3〕}办。
仍由国防部长阅兵，并照旧发布命令，不要改变。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三日关于今年首都国庆节阅兵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上。报告提出，国庆由谁阅兵问题，军委会议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从今年起由各元帅轮流担任，一是仍由国防部长担任，究应如何，请中央确定。报告还提出，近年来，国庆节阅兵所发布的命令内容大体相同，今年阅兵时拟不发布命令，是否可以，请中央决定。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对中央转发王观澜^[1]关于江浙农村 情况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2]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报告中的第二项^[3]“为农民算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这个算法与实际税收和农民负担有某些出入，但是，目前很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摸底，也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和真正了解农民的经济情况，各级党委都应当进行这样的调查，地委、县委在一两个乡或者在一两个合作社内进行调查，省、市、自治区党委选择一两个县直接去进行典型调查。这项工作应在夏季布置，以备秋季之用。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请你们调查所属如临海情形的有多少县，好于临海的有多少县，摸一下底，电告我们为盼！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王观澜，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指王观澜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二日关于江苏、浙江两省农村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的第二项。这一项主要是谈为农民算帐问

五

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6〕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八月中旬的修改〔7〕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还未消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种情况，而不是否认这种种情况，我们才能少犯错误，和尽一切努力争取不犯极端严重的错误，而决不能认为已经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八月二十一日日的修改〔8〕

—

在不久以前，苏联共产党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

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总结了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年的工作经验，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

现在世界上民族的醒觉运动的高潮还在继续发展，它的规模来得非常广阔，它将继续取得重大的胜利。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势必受到亚非两洲的影响，而向前发展起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西方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的后方，失掉了这个后方，帝国主义就将崩溃。现在这个后方的广大部分已经解放了，还有几个部分正在争取解放。

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双重打击之下，殖民主义即帝国主义这个十分丑恶的东西，已经日益显得陷于孤立，并且正在走进彻底瓦解的过程之中。不论是英法等欧洲旧的殖民帝国的挣扎，还是美国建立新的殖民帝国的努力，都将受到彻底的失败。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最凶恶的殖民帝国主义，这个殖民帝国的崩溃，将是人类的最后解放。总之，原来由几个帝国主义大国宰割世界广大地区的局面已经根本改变了，这种局面已经永远地一去而不复还了。

三

在今后，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同各民族国家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继续团结一致，并且在全世界人民的拥护下继续进行坚定的斗争，避免战争，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就确实出现了。因为在这种形势之下，任何一个好战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都很难发动世界战争。这一新形势，在抗美援朝时期已经出现，在最近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更加鲜明地摆在人们的眼前，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不敢将局部战争扩大为世界战争，使得尖锐的国际争端不敢轻易动用武力。

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组成了一个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它们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组织侵略性的军事集团，长期占领西德和日本，并且占领南朝鲜和我国的领土台湾，大规模地进行扩军备战，从而造成了世界的紧张局势，据说这是为了要“防御共产主义的侵略”。他们在口头上虽然大嚷反对共产主义，但是他们的实际目的却不仅仅在这里，他们首先和主要的目的也不在这里。

这个集团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因为以苏联为首的团结得很紧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碰倒的，要碰这个阵营的壁垒，势将引起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他们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社会主义阵营按其本质和实际情况完全不需要向外侵略，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没有什么

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这是一个关系到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内，当着时机成熟了的时候，是否应当夺取政权的大问题。

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标志着革命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由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的和平改革的可能性，就真正出现了。这种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即用教育说服的方法，而不用强力压制的方法。

十

如同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地将在世界上引起种种的结果，这是历史的规律。一百多年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没有不互相影响的。

十一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不要忘记祖国的一部分神圣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人员，同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

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

毛泽东

八月廿四日

这里已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11〕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虽然革命根据地包括了上亿的人口,因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要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并且在根据地内执行了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最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但是我们并不去破坏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去破坏农民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所以这时候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三

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旧时代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专政,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可以执行社会主

义革命的任务。到了它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时候，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鲜明地显露出来了。

四

至于我国的社会性质，目前还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一方面，它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几年才能完全建成。它正处在迅速变化的过程中。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领导，在过去为了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斗争中，在各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中，早已建立起来。那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没有参加这种政权，但是已经有了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工作。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不只是有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团体都宣告他们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六

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

八月三十日的批语^[16]

退少奇同志：

可以这样编排^[17]，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18]。

毛 泽 东

卅日

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根据手稿刊印。

八月三十一日的批语和修改^[19]

—

伯达^[20]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 月 五 日 晚 上 送 阅 为 盼 ！

毛 泽 东

卅一日三时

—

即 退 胡 乔 木^[21]同志阅后，即 送 少 奇 同 志 阅。

此件修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七页上有一个问题〔22〕，请乔木注意。

毛 泽 东

卅一日五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内能够依靠它满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对外也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发展充分有效的国际协作，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四

乔木同志：

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 8000 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 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

毛 泽 东

八月卅一日六时

根据手稿刊印。

九月六日的批语和修改^[23]

—

即送乔木同志：

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毛 泽 东

九月六日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

为了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初办的合作社，党中央要求全国的合作社，在初办的几年内，在正常年景的情况下，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而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一般社员都可以逐年增加收入。为此，合作社不应当任意增加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公积金、公益金的数量；国家的税收也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

伯达同志：

周总理及洛甫^[24]同志今日开始修改政治报告，请你

与总理联系 ,或即与总理处合并举行。

毛 泽 东

九月六日七时

根据手稿刊印。

九月七日的批语。

—

周总理：

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 ,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 ,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 ,否则就来不及了。

修改时请与陈伯达联系。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六时

二

乔木同志：

国家问题这一部分 ,也许你可以在一天内修改好 ,困难问题不很多。但对肃反问题写得太简单 ,没有提党对反革命分子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处理政策 ,请加注意。

不知 15 页上还有这个问题的话没有？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六时

三

伯达同志：

“改造”、“建设”两部分乔木改稿，我看可用，不须大改，但小改是必要的。务请你们在今日加班加点，请于今日晚上十二时以前全部改好，交我看过，再送少奇看过打样，于明日上午交付翻译。我们请总理同时修改，请你与他联系，于晚上九时以前索取他的改样，由你酌量采取。头三部分〔25〕，今日也要争取改好，我已〔告〕总理注意，改好后交你。

毛泽东

九月七日七时

四

周总理：

政治报告的头三部分，请你主持，于今日改好。形势部分，可以大修或重写。但请于今晚十时前，交伯达看一下，然后交我。“改造”、“建设”两部分请你与富春〔26〕一道修改，请需于今日修好，于晚上九时交伯达汇总。以上各部分我和少奇看一下以后，必需于八日上午交付翻译。

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27〕，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

毛泽东

九月七日十时

五

乔木同志：

“国家”部分内容贫弱，和“改造”、“建设”、“党”各部分分量不相称，似需大改。请你将一、二次稿看一下，好好想一下，再行动手。如今日不能完稿，可于明日完毕。如你需要，可找彭真、瑞卿〔28〕谈一下。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十时

根据手稿刊印。

九月八日的批语

—

伯达同志：

今日你和其他同志可以休息一天。

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29〕，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毛 泽 东

九月八日八时

—

少奇同志：

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

飭人將改處準確地抄在一個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
立即付印，付翻譯。

毛 澤 東

九月八日九時

根據手稿刊印。

九月九日至十三日的批語

—

尚昆〔30〕同志：

少奇同志修改處請交翻譯注意照改。改印，暫可等一
下，待各同〔志〕修改意見交來，汇总修改，並經少奇和我看
過後，再行付印。

毛 澤 東

九月九日八時

—

伯達同志：

國家政治生活部分，讀改時，請邀彭真、羅瑞卿、董
老〔31〕三同志參加，今日改畢，照前抄三份，分送劉、周〔32〕
及我。

毛 澤 東

九月十日五時

三

少奇同志：

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清样，付翻译。

总理改本，用后请送伯达，因为里面有批语处，需请伯达再修改的。

此外，请将已定稿的各部分（冒帽子及一至四〔33〕）立即印成一本，于今日发给所有代表，每人一份，并附通知，请他们收到即看即加修改，于九月十二日下午送回中央。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四时半

四

少奇同志：

同意你的修改。我又修改了一些，另有两处是和乔木、伯达商量修改的，请酌定。周总理今晚没有时间看此件，他在改他自己的报告〔34〕。因此，请即将这一部分的两个改本合在一处，立即付印，付翻译。同时印发全体代表，请他们提意见，于九月十三日下午交中央。

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二时半

五

即送少奇同志：

这些修改都很好，可以即刻付印，付翻译。只是“国际关系”第六页，“以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在经济上，有的是在政治上）”这一些新增的字〔35〕，可以不要，以求与周总理报告一致。这原〔是〕我提议的，现觉应该取消。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七时半

根据手稿刊印。

九月十四日的批语

—

即送少奇同志：

（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

（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再改。

毛 泽 东

九月十四日二时

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二

伯达、乔木、家英〔36〕同志：

（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我们起床后再看改样好了。

（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

毛 泽 东

九月十四日上午六时

三

杨尚昆同志：

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部分，请即交帮助翻译的外国同志去作翻译，不要等候修改。陈伯达同志等的修改稿，要今天下午才能交出。据我看，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总理报告的翻译工作，亦请抓紧。

毛 泽 东

九月十四日上午六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稿，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在讨论、修改过程中，毛泽东写了

不少批语，并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本篇收入的是他在多次过程稿上的批语和加写、改写的文字，这些文字用宋体字排印。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这篇报告，报告的全文发表于同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2〕 八月上旬的批语中，（一）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九五六年八月八日印发的《中央委员会向八大的政治报告（初稿）》的封面上，（二）至（五）写在政治报告初稿有关文字的旁边。

〔3〕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五十五页上，这页上的内容主要是说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间，存在着只追求数量和曲解节约而不管质量的错误思想和极其有害的自满情绪，结果造成了一九五五年有些工程的质量事故。

〔4〕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七十八页以下一段文字的旁边：“我们有些同志不愿意承认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他们根据中国革命胜利的老经验来否认提高文化的迫切需要。是的，当劳动人民大多数是文盲，文化水平很低的时候，只要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逐步提高，并且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就能够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并且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在那个时候，认为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然后进行这些斗争，那是荒谬的。但是在已经完成了这些斗争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而要进行建设，就要有文化，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

〔5〕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一百一十一页上讲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居于核心领导地位而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一段文字的旁边。

〔6〕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一百四十四页以下一段文字的旁边：“我们还应该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

义建设”部分时所写的批语和修改；(三)是关于周恩来联系修改政治报告的批语。

〔24〕 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25〕 指政治报告稿的“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

〔26〕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27〕 指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28〕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29〕 指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30〕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1〕 董老，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3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33〕 指政治报告稿的开头部分和（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二）社会主义改造，（三）社会主义建设，（四）国家的政治生活。

〔34〕 指周恩来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35〕 这些文字原加写在以下一句话中：“对于我国的社会主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的修改和批语^[1]

（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

—

第三十七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二

即退小平^[2]同志：

两件改处都看过，同意这些修改。我只在党章第三条觉得应当添三个字^[3]，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十日廿二时

对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 五年计划建议草案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

—

要一个说明理由的文件，供内部用。

二

400—450 亿（军），130—140 亿（政）= 530—590=2350 亿的 22%，比现 32%，减 10%；其他支出：（1）还外债，（2）援外，（3）物资贮备，（4）总预备费，（5）信贷资金，共计 10%左右。

三

要把历史上最高年产量，1952 年产量，1957 年产量都列出绝对数字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周总理：

有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九日五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一九五六年八月印的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第三次草稿上。本篇（二）是对第三次草稿中以下两段话的批语，这两段话是：“在增强国防力量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缩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开支，而增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出，以加速国家的工业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应当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58% 左右，提高到 60—70% 左右。”后来，建议的草案修改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加写了以下的话：“而用于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支出，应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32% 左右，下降为 20% 左右；其他部分用于国家的物资储备、信贷资金、归还内外债款和总预备费等。”本篇（三）写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印的这一建议草案中所列的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重工业产品的计划产量及其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一九五七年计划产量的百分比的数字表旁边，后来的草案修改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分别列出了一九五七年计划产量、一九五二年实际产量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绝对数，删去了原有的百分比数字。本篇

关于支持埃及收回 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八月)

似应有几句话劝告英法政府和英法人民不要做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应过于激动和走极端,致使事态扩大,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英法。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支持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初稿)上。后来,这个联合声明改为中国政府声明,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在此前后,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发表了有关声明。根据毛泽东的批语,中国政府的声明增加了有关劝告英法政府的一段话:“中国政府认为,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主权行为是不容许任何外国进行干涉的;有关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问题,是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的。英国和法国在这次事件前,曾经采取过一些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比较明智的行动。中国政府希望,英国和法国将本着这种精神来对待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任何武力威胁和武力干涉的行为将必然引起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对英国和法国来说,也决不会是有利的。”

给达赖喇嘛^[1]的信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

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很高兴。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出不了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陈毅副总理回来，转达了你的意见。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

望你保重身体。

有事随时给我写信。

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2]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

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

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3]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4],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東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東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理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東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5]。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艺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

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6〕的文章,今天用不着。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7〕。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8〕，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

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

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根据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已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时的谈话。

〔2〕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 38 线作为两国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分界线，分界线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这条线通称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时，朝鲜人民已在这条线以北地区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条线以南地区还在美帝国主义扶植的李承晚傀儡集团统治下。

〔3〕 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一八八九年七月在巴黎成立。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初期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立场。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派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

对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稿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退邓小平〔1〕同志。

此件〔2〕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3〕,请你们酌定。第23页上批了一点建议修改的意见〔4〕,请考虑。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23—32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请考虑全文都增加一些标点。

毛泽东

八月廿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指邓小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

〔3〕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修改稿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在报告的第一部分第一段,“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大的改变”之后,加写了“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十四个字。另一处是在报告最后第四段分析我们党的胜利的原因时,在“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前面,加写了“首先和最主要地”七个字。这两处修改意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 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

(一九五六年八月)

陈、陆、胡、王稼祥、李维汉、胡绳、田家英^[2]。

a 大会宗旨：总结经验，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有用
〔因〕素，外宾四十九国^[3]，为建设社会主义为而斗争。

b 除了选举以外，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团结那与自己
有过斗争的人^[4]。

七大选举经验是成功的。

时间安排是充裕的。

资产阶级。

c 150—170^[5]。

上届中委。

三八线^[6]。

d 36小时发言时间^[7]是充裕的。

前门饭店。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讲话提纲，写在印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日程安排、会议规则等六个文件的目录上。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这篇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为《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2〕 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指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他们都参加中共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

〔3〕 指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实际上，后来参加八大的共有五十六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代表和观察员。

〔4〕 这里指要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说：“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又说：“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说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

〔5〕 指中共中央准备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额。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八大正式选举出第八届中央委员九十七人、候补中央委员七十三人，共一百七十人。

〔6〕 “三八线”，这里指考虑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以“三八式”干部划线问题，即一九三八年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干

对彭德怀^[1]在中共八大发言稿 的批语和修改^[2]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

退彭德怀同志：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作了一点小的增减修改，请斟酌。

毛 泽 东

八月卅日晨

文字通畅，可以不再缩减。

根据手稿刊印。

—

虽然由于我军现代化建设为时不久，各军种、兵种还未能达到完全现代化的程度，但是已经达到我国空前未有的规模。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我军现代化水平必将进一步获得提高。在这里，我要表示对于我们伟大盟

对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 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稿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

—

即送周总理：

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九时半

二

周总理：

你的报告^[1]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2]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十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全体起立，默哀）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热烈鼓掌）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热烈鼓掌）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热烈鼓掌）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热烈鼓掌)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做得是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热烈鼓掌)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热烈鼓掌)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

断努力 ,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鼓掌)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 ,(热烈鼓掌)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 ,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 ,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 ,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 ,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 ,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 ,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 ,做了许多工作。现在 ,比起整风运动以前 ,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 ,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 ,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 ,这就是 :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 ,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 ,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 ,大力克服我们队伍

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鼓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鼓掌)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们并没

接受埃及大使拉加卜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阁下被任命为第一任埃及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感谢阁下对我本人的友好祝贺。我愿意趁此机会通过贵大使向纳赛尔总统表达中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真诚的敬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埃两国都是世界上文化最古老的国家。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诚如阁下所指出的，有着悠久的历史。殖民主义者曾经阻碍过中埃传统关系的发展，但是赢得了各自的民族独立的中埃人民，又建立起了新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人民珍贵同埃及人民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并且相信，这种关系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作为亚非两个爱好和平国家的中国和埃及间的友好合作，无疑地将对维护和巩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作出重大的贡献。

大使先生，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埃及共和国驻中华

关于讨论和修改中共八大 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

尚昆〔1〕同志：

请于今日早晨用电话通知各代表团长和各省市区的小组长，立即阅读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今日下午二时以前各开小组会讨论一次，将修改意见注在草案上，送交秘案书处。请秘书处于今日下午将各组修改意见加以汇总送交胡乔木〔2〕同志，以便修改。

毛 泽 东

九月廿四日五时

—

即送胡乔木同志：

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

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 谈话和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月)

一 谈话记录

时间：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参加人：蒙方：达姆巴^[1]（团长）、曾德、奥其尔巴特（大使）、
哈什冈白、策热布桑巴

中方：王稼祥^[2]

毛主席（以下简称主席）：这几天你们很累了吧？

达姆巴（以下简称达）：不，不累，我们很舒服。

主席：蒙古同志是好同志，好朋友。你们是友好的国家，友好的党！

（接着主席就问候泽登巴尔^[3]同志）

达：他很好，他跟桑布^[4]同志向您问候呢！

主席：谢谢！请你们替我向他们问候！

达：谢谢！我们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援助。

主席：不，不要这样！中国是个大国，这是我们的义务，是

你们的权利。我经常听到你们这样讲，同时经常看到文件上也这样写，我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因为三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曾剥削过你们、压迫过你们，他们曾留下了不少的债务，因此，今天我们要还这些债务。过去我国国内少数民族也同样受过压迫，我们对他们也要还债，这是我们的义务。

我国藏族人口的一百二十万人直接属于拉萨，其他一百万人口分布于青海、云南、四川、甘肃等地。蒙古的宗教情况怎样？喇嘛多不多？总人口多少？

达： 过去很多，现在非常少了。在革命初期，有些喇嘛干过坏事情，将他们处理了。有一些参加了劳动以及其他工作。现在还有极少数的喇嘛。我国总人口八十万。

主席：蒙古工农业的发展情况如何？

达： 革命前我们是个很落后的国家，在革命的年代里，由于苏联的热情帮助，我国人民在工业方面、牧畜业方面以及文化教育方面都有了很好的进展。

主席：蒙古农业也很发展了吧？

达： 今年刚开始发展农业。

主席：水够不够？

达： 在我国，水是很缺乏的。

主席：雨量如何？

达： 平均年雨量是一百二十至三百毫米（其中森林地带

是三百毫米，而沙漠地区是一百二十毫米)。

主席：打井怎样？

达：沙漠地区打井困难。

主席：那么，建设一些蓄水库，储下水来，以供使用，这样不可以吗？

达：在沙漠地带很困难，水储不下，很快渗入地下。

主席：你们境内有哪些大河流？

达：色楞河、鄂嫩河、克鲁伦河等。

主席：向西北方向流去的是哪一条河？

达：鄂嫩河、克鲁伦河。

主席：蒙古历史、文化的发源地是哪里？

达：鄂嫩河、克鲁伦河一带。

主席：你们不可以在这些河流上建筑一些水闸、水库、蓄洪沟等工程吗？

达：人民和我们都迫切要求那样做，但力量达不到。

主席：现在我们也有些困难。但几年之后，我们在这方面帮助你们。

达：谢谢。

主席：今年河北闹水灾，三千万亩农田遭到了水祸。中国的水利工作，至今还没有能够很大发展，再有十年之久可能解决。不过，我们在这方面对你们的援助，用不了等十年之久。

达：去年你们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援助，派了一万三千工人和技术员，这在工业和其他建设方面起了推动作

用。并且今年还给了无偿的一亿六千万卢布。因此，蒙古老百姓非常欢欣鼓舞。

主席：不，不，上边已经说过，这是我们的义务。那些数目是太少了，你们一提，我就觉得惭愧。

达：集二线^[5]对我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主席：蒙古的农业现在怎样？

达：现在较过去有了一些发展，但由于人力缺乏，很大一块土地至今还未开垦。

主席：这样不好，应该开荒。你们定居了吗？

达：定居对我国农牧业发展，有很大好处，但现在还未定居下来。

主席：这不是一下子办得到的，要逐步地办到，因为一个地方的草，是有限制的。我国有的省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定居下来，还可以种菜，种庄稼，这样人口才能增加。

达：对！（指曾德说）他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任。您的这些建议，对我国将来的计划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主席：发展农业、牧畜业，首先要发展水利工作，这里包括水闸、蓄水库、水沟等工程。另一方面，牧草是很重要的，对你们来讲，“草就是油”。因此，你们应当培植牧草，应当采用深耕的方法，这样牧草就能长得又高又多，然后定居下来就有条件了。

达：是的！我们重视您的这些谈话。

主席：你们可以早一些开始水利工程的准备工作。这方面

主席：西伯利亚那里曾有一个高车族，据说他们都坐在高大的车子上。高车族是不是你们的祖先？

达：老人们都说，古代的祖先搬家时都用很高的车拉上所有的东西。

主席：你们有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

达：关于十二世纪以前的记载，现在还没有，十三世纪以后的有些记载。这一方面的工作苏联帮助着我们。十三世纪以前的蒙古历史，跟中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将来我们在这方面，可能还要跟你们一起进行研究。

主席：很好，今天我们谈了许多有关历史的事情。

达：我们的前途很宽广，因为有苏联和中国的兄弟般的援助。今后，我们更要好好努力工作。

主席：应该好好发展。

达：我再一次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激，你们对我们的援助是兄弟般的伟大的援助。我们不能把它当做“债务”来看待。

主席：但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同任何国家都以平等共处，过去我们压迫了你们，因此现在要向你们认错。不仅对你们这样，而且对国内少数民族也是这样的。过去，我们压迫了他们，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不认错，就不能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实现民族平等。这是有根据的，这不是漂亮话。是不是？过去我们压迫过你们，但你们现在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给你

们的援助是小小的，这是在还债，不是援助。这样才能互相信赖。你们说是援助，这也好，你们这样说也表示平等。

达：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我们的过去的和将来的一切援助表示感谢！中蒙两国劳动人民一向是友好的，反动阶级所干的事情是另一回事。

主席：有些中国工人去蒙古了。你们应该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以免他们犯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毛病，以免他们称王称霸。

那里的中国工人或工作人员如果犯错误，你们应该向我们反映。

达：大多数的人都很好，少数人虽有时犯毛病，但那也不是有意识的。同时，谁都会有一些缺点的。

主席：应该教育他们，如果有人犯严重错误，就应当依法处分。你们应以主人翁的态度站起来，教育他们。

达：我们那里中国工人中有二百名党员，他们带领着其他工人很好地工作着。

主席：好！工人一共有多少？

达：连家属一共一万三千人。过去的华侨一部分已回国，现在只剩下四五千，但这些人也都已年老了。

主席：蒙古人指挥他们吗？

曾德：是的！蒙古人以主人翁的态度指挥着他们。

主席：中国工人中有作木工活的吗？

达：有。此外还有制砖的，以及其他各种行业。

主席：让他们带蒙古徒弟吗？

达：他们分别地带着徒弟呢！

主席：以后在农业方面，我们可以用人力援助你们，其数目可以是十万，也可以是二十万，甚至也可以达到三十万。其中某些人也可以帮助你们搞牧畜业。

达：对，不过事先我们应该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和计划工作。不然，接到那些人后，住宅等各方面要发生困难的。

主席：对！应该逐步地进行这些工作。你们有八十万人口，因此可以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了。

达：我们有五万二千多工人。

主席：八十万人口中有五万多工人，这数目不算小了。有使用机器的吗？

达：使用着半自动机器。

主席：有没有自动化的？

达：没有。

主席：那么将来可以装置一些。关于这一问题，将来我们互相可以谈一谈。

达：由于你们的援助，我们现在有了火柴厂、瓷器厂，但火柴厂所需要的火柴盒等都是用手工制作。

主席：火柴生产的数目多少？

达：全国总共需要两千万盒火柴，明年生产可以达到这一数目。但在国内销路不太好。

主席：你们的市场怎样？

达： 市场，有是有，但很小。

主席：今天我们谈得很好。

达： 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感谢您对我们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感谢您对我们讲了很有益的话。我们回去后，把您今晚所讲的话，当做今后工作上的指针。当我们分手之际，我再一次代表我党中央和全体人民向您致以衷心的感谢。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
刊印。

二 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

外交部：

这个谈话，应抄送我驻蒙使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及各省、市、区党委阅看，因为各省市区都有少数民族问题，另抄给统战部和民委党组。以上请会同尚昆同志办理〔6〕。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达姆巴，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2〕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3〕 泽登巴尔，当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对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 祝贺中尼协定^[1]签订的电报的复电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加德满都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陛下：

值此中尼协定签订之际，承致祝贺，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尼泊尔王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中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这一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的协定的基础上日益巩固和发展。祝国王陛下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6年9月25日

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载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 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主席在宴会开始时致词,对阿查里雅首相和他的夫人以及同他一道来中国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说:尼泊尔同中国有长久的历史关系,两国人民间有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之间有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座山不仅连结着中国和尼泊尔,而且也连结着中国和印度。所以,印度、尼泊尔和中国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都是近邻。毛泽东主席接着举杯祝尼泊尔国王陛下的身体健康,祝尼泊尔王国首相阿查里雅阁下和他的夫人以及同他一道来中国访问的朋友们的身体健康,祝在座的印度朋友们的身体健康,祝中国、尼泊尔和印度三国团结一致,祝尼中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最近签订的协定〔1〕。

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新闻稿刊印。

注 释

〔1〕 见本册第 224 页注〔1〕。

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 苏加诺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日)

总统阁下,印度尼西亚的贵宾们,
女士们,
先生们:

我们热烈地欢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苏加诺总统前来我国访问。我们感谢苏加诺总统给我们带来了八千二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兄弟般的友谊。

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和苏加诺总统怀有最大的敬意。曾经被殖民主义统治了三百五十年的印度尼西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后,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现在,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为维护民族团结、逐步肃清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着勇敢的斗争。苏加诺总统在这些斗争中所起的卓越作用,和最近在欧美各国访问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同声赞扬的。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

印度尼西亚执行积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无论对

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世界和平,都有很大好处。万隆会议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曾经作了重大的贡献。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事务上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爱好自由和独立的人民,都在反对殖民主义。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问题上,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继续对埃及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殖民主义者希望我们不团结,不合作,不友好。我们必须用加强团结、加强友好合作来回答它们,我们必须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

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历来就是很好的朋友。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友谊,更加加强了。我深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上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必将更加巩固和日益发展。

我建议大家举杯,
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谊,
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
为苏加诺总统的健康,干杯!

根据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在苏加诺总统为印尼建军 十一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

总统阁下，朋友们，同志们：

在印度尼西亚建军十一周年这个重要的节日，我首先要向苏加诺总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祝贺英勇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在争取实现印度尼西亚人民理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什么是印度尼西亚人的理想呢？苏加诺总统在最近对我们所作的几次重要的演说中，已经说得很明白，那就是：独立的理想、和平的理想、新世界的理想。这些也正是中国人民的理想。为了争取实现这些理想，中国人民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而且永远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忠实的战友。

总统阁下，六天来，你已经看到了中国人民对你的欢迎和敬爱。你的访问已经使我们两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明天，你就要离开北京，不久以后，你就要离开中国。虽然我们又将要相隔几千公里，但是，我们的心，我们两国人民的心，将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三十九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

德·特·谢皮洛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以及在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鼓舞了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为争取美好未来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合作也有了新的发展。我们高兴地看到，最近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1〕。这个宣言充分地表现了苏联忠于社会主义各国伟大

在第五页和六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5〕，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一日三时

三

少奇、陈云、小平〔6〕阅，此件〔7〕似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小平酌处。

毛泽东

十一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看了山东省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宋保恩的《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后写的批语。这篇文章和批语（去掉抬头和第一句话）后来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本篇（二）写在陈云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关于拟将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下发征求意见给邓小平的信上；本篇（三）写在国家计委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报送的商业局一位副处长关于江苏省昆山县同心社养猪办法的报告上。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一九五六年六月《农村工作通讯》第二期刊载的《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

〔4〕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纪念孙中山先生^[1]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零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 会议上的发言^[1]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一)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都有所增长。

(二) 1956年的国家建设事业是有成绩的。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在308亿元(旧价)的预算开支中,有20亿元到30亿元用得不恰当或者用多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15亿元左右。

(三) 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

(四) 1957年的预算,收支各为308.65亿元(其中包括自筹资金2.15亿元。308.65亿元折合旧价为317.65亿元)。在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为157.26亿元,社会文教支出为39.3亿元,国防支出为57亿元,行政支出为25亿元,债务支出为8.42亿元,援外和其他支出为6.41亿元,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为5亿元,信贷资金为5亿元,总预

备费为 5.26 亿元。在经济、文教、国防、行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合计为 126.73 亿元(折合旧价约为 135.73 亿元),其中自筹资金 2.15 亿元。1957 年度预算是平衡的,但是打的较紧,并且应该使它与现金平衡相结合。

(五)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1957 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 1956 年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地压缩。虽然如此,总的说来,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因为 1957 年的收支均比今年有所增加,收入增加 22.5 亿元,即增长 8.2%;支出增加 9.53 亿元,即增长 3.2%。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

(六)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

(七)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

给黄炎培^[1]的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

你们的会议^[2]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

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 汇报工作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退彭德怀^{〔2〕}同志：

可以准备在春季或春夏之间了解几个军事部门的工作情况。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彭德怀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你在今年夏季说过两次，军事系统各部，也要照政府各部一样，系统地向中央汇报一次工作。我认为这不仅对于中央政治局或常委会的同志了解国防建设是必要的，同时对于军事系统各部、各军种、兵种的同志也是一次很大的鼓励。因八大前后事情很忙，这项工作未能进行，可否在明年一月初旬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进行汇报。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对中央关于西藏问题复电稿 的修改和批语^[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

中央和毛主席历来认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2]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3],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工委可以在最近约自治区筹委会和噶厦的主要官员座谈,向他们说清上述中央的方针。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二

少奇阅,即刻发,再送朱、陈、彭、谭、徐冰、洛甫、

汉夫〔4〕阅。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西藏工委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电告中央，西藏拉萨等地可能发生暴乱。中央统战部于十五日为中心代拟了关于西藏可能发生暴乱对策问题的复电。这份电报原只发给西藏工委，毛泽东审阅时在电头加写了“并发驻缅甸大使馆转周总理，另发驻印度大使馆知悉”等文字。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央复电稿集中修改的一段，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3〕 指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十七条。

〔4〕 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汉夫，即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密切 军队和地方关系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请总政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将此件〔1〕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及志愿军党委，一律仿照办理，并以结果上报。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南京军区党委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关于进一步密切军队和地方关系问题的建议给中央军委、总政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在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上还存在着某些不够协调的情况。例如，有些部队对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地方全面工作照顾、配合不够，向地方提出的有些要求偏高偏急，而有些地方工作同志因对部队情况缺乏了解，对其特点和需要也照顾不够，等等。为了进一步密切军队与地方党政的关系，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报告建议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月期间，请地方各级党委主持召开有驻军党委同志参加的会议，检查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商讨今后密切联系、加强团结的措施，研究如何共同努力加强治安工作，搞好新兵征集、复员转业等工作。

给黄炎培^[1]的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前信^[2]无甚深意，以不发表为妥。水调歌头：逝者如斯乎的“乎”错了，请改为“夫”字。赠吴湖帆先生、张叔通先生^[3]各五百元，敬请转致为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给黄炎培的信。见本册第 255—256 页。

〔3〕 吴湖帆，建国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张叔通，建国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江苏省和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参见本册第 209 页注〔3〕。

给 杨 开 英^[1] 的 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2]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仍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尚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3]及杨子珍夫妇^[4]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
书信选集》。

注 释

[1] 杨开英，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堂妹。当时任大连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

[2] 毛世美，现名毛臻，毛泽东的远房侄孙。

[3] 指杨开智和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4] 即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字子珍）和他的夫人李崇德。

对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加强 地方政协工作意见的指示稿的 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在中央指示^[1]的末尾加了一段，请少奇、徐冰^[2]同志
再阅，交尚昆^[3]办。

—

大约在一九五七年夏季，中央将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全
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会议，请你们早作准备，将所属地区的
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少数民族工作）加以认真的检查和安
排。对于有些在党外人士面前爱摆老爷架子，宗派主义作
风极为严重的同志，应当认真地给以批评和教育，端正他
们的态度和作风。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 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各地合作社对于富裕中农急急忙忙叫他们入社，或者让他们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按照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报告〔2〕所规定的策略，是首先让一部分觉悟了的贫农下中农入社，然后让后觉悟的大部分贫农下中农入社(分批分期)，不要忙于动员富裕中农入社。后来在合作化潮流高潮中富裕中农勉强入社，就有些人来说，当时也很难劝阻。今年分配所得，他们的收入一般都有些减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中央认为让一部分(不是大部分，更不是全部)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请你们考虑这个政策是否可行。如果认为可行，就下决心让一部分人退社。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关于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转发了广东省委的这一报告。

给周世钊^[1]的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东园兄：

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2]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3]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顺祝

平安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周世钊，又名东园，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3〕 曹子谷，即曹籽谷，解放前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湖南大学校长。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 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

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

二

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团结无产阶级，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地击退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世界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沿

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三

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四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这个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

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 肃反工作的意见^[1]

(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

—

增加一条,这是在中央会议上谈过的,并已向陈叔通、荣毅仁^[2]及各省市资本家代表宣布过。

毛 泽 东

一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

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肃反工作的问题,不但应吸收那些自愿参加的资方人员参加,而且应和工商联及民建会协商,取得他们同意,方可进行。对于资方人员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在结案时也要有工商联民建会参加审查,得其同意,方可结案。各省市目前是否在私方人员进行肃反,由各省市自己决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印发《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 几点意见》一文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

尚昆〔1〕同志：

请将此文〔2〕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3〕各同志。

毛 泽 东

一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必强调了。过去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对中有些界线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作为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文章还说，百花齐放的

给臧克家^[1]的信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有手稿)

注 释

[1] 臧克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对邓子恢^[1]关于按原定计划动工 修建三门峡水库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研究，请陈云同志的五人小组^[4]处理。

毛 泽 东

二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指邓子恢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关于建议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三门峡水库是黄河综合利用的水力枢纽，它的建成将从根本上解决千年洪水灾害，保证黄河不改道，使冀、鲁、豫、苏、皖五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保障。目前部分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建议不要停止兴建，按原定计划在今年二月开工，以争取在一九五九年汛期内部分蓄洪。

〔4〕 指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任组长。

